

懷念長者風範：

陳誠與傅斯年

●王 民（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）

非常際遇奇妙因緣

人生的際遇，各有不同，而際遇則是很難預料的，有時出乎常情常理之外，我在台灣的一段際遇，就是非常奇妙的，因為很少有人知道，所以現在寫出來。

我追隨陳故副總統辭公多年，然而，辭公與我，素無淵源，所以民國卅九年春，辭公第一次出任行政院長，約我到行政院工作，連追隨辭公多年的舊屬，也不知是怎麼回事，而感到詫異。一年多以後，我才知道，原來是當年台大校長傅孟眞（斯年）所推荐的。不過，在台灣，孟眞先生與我，也是素昧平生，後來毅然推荐我為辭公工作，這一段奇妙因緣，在我的人生過程中，是值得記述的趣事。

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，主要的是懷念陳故副總統辭公與台大故校長傅孟眞（斯年）先生的風範；因為從這兩位長者的風範，使我深深體會，當年國家能從風雨飄搖之中，一步一步走上安定繁榮的大道，實非偶然。語云：「國者，人之積也。人者，心之器也。國事者，一羣人之心理現

象也。故社會之隆污，繫乎人心之振靡」，而人心之振靡，又繫於在上之領導人，能否大公無私，無我，明辨是非利害，維護正義公道，激發人心士氣。從我的奇妙際遇，或者亦可窺知國家治亂安危之機。回想當年危難，再看今日情況，不免憂心忡忡。

陳辭公突然的約見

民國卅九年春，陳辭公（誠）奉命出任行政院院長不久，有一天上午，行政院機要室主任劉慕曾兄忽來電話，告以辭公來電話，要約我上山，時辭公正在頂北投台電招待所休息。於是我便到行政院，隨同劉慕曾兄前往，約在上午十一時到達頂北投台電招待所，由姚參謀慶辰接待，進入會客室。那是一幢破舊的日式房屋，會客室陳設很簡單，只有一些破舊的椅子，或為木製或為藤製，會客室中間，擺了一張吃飯的圓桌，也很破舊，圍了圓桌是幾張木椅。

劉慕曾兄與我坐定之後，姚參謀便入內通報，不到五分鐘，辭公就出來了，步履輕健，神情愉快，面帶微笑，上身穿了一件舊夾克，順手便

拖了一張木椅，坐在我們對面，開口便問：「我想請你到行政院來幫忙，好不好」。我聽了這話，有點受寵若驚，便連聲說：「好，好，好。」於是辭公又說：「關於職位問題，你和慕曾去商量一下好了。」起身時又說：「你們就留在此地吃午飯好了」，於是返身入內。

到了開飯時間，辭公先走出來，隨之而出的，是傅校長孟眞先生，陳夫人與傅夫人。辭公的飲食很簡單，只有五菜一湯。在吃飯的時候，我們敬陪末座，只有辭公與孟眞先生談笑風生，表情輕鬆愉快。飯後，劉慕曾兄與我便辭別下山。這是我第一次單獨見辭公，也是我後來追隨辭公工作的開始。

久藏心中的悶葫蘆

我與辭公並無淵緣，他怎會約我到行政院工作？究竟是誰推荐呢？當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追隨辭公，為什麼會輪到我這個無名小卒呢？最使我感到奇怪的，就是見面時，辭公對於我的學歷、經歷、工作與家庭的情況，一句也沒有問，好像追隨他多年的舊部一樣，為什麼辭公用人，如

此深信不疑呢？如此信任推荐我的人呢？在回台北的途中，我問慕曾兄，辭公要我到院工作，是誰推荐？慕曾兄說：「我也不知道」。後來我問追隨辭公多年的舊部，也都同樣不知道，這個悶葫蘆，在我心中藏了很久，一年多以後，才被我自己打開。由此亦可見辭公的開闊胸襟，對人的信任了。

當年我在名義上雖為行政院編輯室主任，實際工作是替辭公搜集整理各種重要資料，提供決策參考，替辭公撰寫施政報告、政治報告、講稿，還有些辭公交代的工作。所以編輯室雖不是什麼重要單位，但我的工作却很特殊，也很繁重。每天，我要在辭公到院之前趕上班，等辭公下班以後才敢走，因為他隨時會找我，有時一天會找我多次。我在行政院下班後，還要趕到新生報上夜班，因為我兼任該報總主筆，所以每天工作都在十二小時左右。

辭公可能早有潛伏肝疾，所以每年夏季，必到近郊住一些日子休養，地點或為陽明山台電招待所，或為烏來台電招待所，或為谷關台電招待所，每次我都隨往。不過實際上辭公并未休息，仍在郊外處理公務，有時是修改重要報告，所以我因循而忙，但士為知己者用，故忙而無怨。

在院工作，也許由於性質特殊，所以辭公一再交代，我的公事，直接呈送院長室，有事隨時來見，不知內情者，或以為我不把副祕書長、祕書長與副院長放在眼裏，狂妄自大，恃寵而驕；其實，是辭公面諱，我不敢不遵命辦理。

辭公因為秉性剛正，所以部屬都很敬畏，做

人做事，不敢苟且，我當然不敢例外。不過，辭公雖然很嚴厲，但我追隨辭公多年，他從未對我發過脾氣，疾言厲色，不高興的時候，也不過板起面孔，悶聲不響而已。我因毫無政治經驗，有時說話，難免不夠謹慎，但辭公知我此心無他，所以從不計較。

辭公為什麼要我到行政院工作，是誰推荐，為什麼對我如此信任？乃是我心中一個悶葫蘆，等到一年多以後，這悶葫蘆才被我自己打破。

卅九年春，辭公約我到臺北投台電招待所見面吃飯；吃飯時，有傳校長孟眞先生夫婦在座，那時我便有點懷疑，是否為孟眞先生所推荐。後來又想到，孟眞先生與我，也只是段文學緣，對我并無深入的了解，不可能輕率推荐。在院工作，孟眞先生仍然時常約我晤談。

有一次，在孟眞先生家中書房聊天，在座的還有當時台大教務長錢思亮先生，因為彼此已經很熟，所以我忍不住問孟眞先生，辭公找到院工作，是否為他所推荐。他口銜煙斗，微笑答道：「辭修做了行政院長，找我要寫文章的人，我想了又想，認為你是最適當的人選，便當面加以推荐，辭修欣然接受了。」至此，我心中藏了一年多的悶葫蘆才被打開。

孟眞先生對我的了解不深，因為一段文學緣，後來似乎成了忘年之交，此外，別無淵源，他居然向辭公推荐我，而在辭公用我之後，又從未提及辭公用我，是他推荐的。這種為國舉才的風範，使我感念難忘！

中山堂堡壘廳掌故

現在要談談傳孟眞先生與我相識的經過。我與孟眞先生相識，也是想不到的因緣。當年，孟眞先生任台灣大學校長，為權威學人與士林泰斗，專心辦學，作育人才，所以我雖是新聞記者，但因主管新聞評論，也與孟眞先生素無來往，更何況在年齡上，他是前輩，我為後生。

卅八年春，我在台灣新生報擔任總主筆，工作非常辛苦，所以寫的文章很多；因為文章寫的多，就不太願意自己的姓名時常見報，於是常用筆名，如愚公、一心、佚名、眞之類，我也記不清多少個筆名了。

當時大陸局勢紛亂，國是意見紛紜，尤其是知識份子，仍多以為自由主義可以與共產主義相容共存。從大陸的失敗，我深感這是一個思想上的很大危機，於是在新生報上發表了一篇專論，題為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何以不能相容」，署名為一個「眞」字，意謂此文所說的都是眞話，絕非騙人的反共八股。

我寫這篇文章，在說明我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認識，純屬哲學思想的討論，沒有任何政治色彩，原以為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反應；那知此文發表之後，竟在知識界引起了震撼，很多學人以爲是當時台灣大學校長傳孟眞先生所寫，因為此文的署名是一個「眞」字，紛紛打電話問他，孟眞先生則說，他也正在託人打聽，此文作者是誰。

有一天，我到報館工作，忽然來了一位同業

看我，閒聊後便問我，前幾天新生報社發表的那篇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何以不能相容」的專論，署名一個「真」字，有人託他打聽，作者究竟是誰，可不可以告訴他。因為彼此是同業，也說不上什麼業務機密，於是我便老實告訴他，此文是我自己寫的。隔了幾天，忽然台大校長室來電話，告訴我說，傳校長想跟我當面談談，於是約定時間，我便到台大校長室去看孟真先生。孟真先生衣著素來隨便，甚至不修邊幅，但熱情洋溢，告訴我，他很欣賞那篇專論，所以約我來談談，於是我們便討論那篇專論的內容及其哲學思想問題，談得非常愉快。臨別時，孟真先生還說：「我想常常約你閒談，如何？」我說：「十分樂意。」以後，孟真先生便常約我到家閒談，而所談的都是國家大事與讀書問題。有時，孟真先生因血壓不好，在家臥床休息，竟也約我到床頭聊天，其情可感。

孟真先生有真性情，有感於心，便出之於口。卅八年夏，陳辭公以台灣省主席的身份，邀約新聞界負責人在中山堂貴賓室餐敘，致詞後，便請孟真先生講話，不知為何，孟真先生竟說，他在台灣只看到一篇好文章，是討論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何以不能相容的哲學問題，在座的人都為之吃驚，我更急出一身冷汗，生怕他說出此文作者的姓名，即此小事，亦可想見孟真先生之真性情了。當時，陳辭公認為新聞界是反共的精神堡壘，應將貴賓室改為堡壘廳，此中山堂堡壘廳之由來也。

我對孟真先生雖然所知不多，但深感他有真

性情，敢愛敢恨，敢罵敢打。據說，他在學生時代，五四運動時，他扛着大旗，領導北大學生去打曹汝霖的住室。大陸撤退前夕，他在觀察雜誌發表一篇：「宋子文非下台不可」的文章，於是不久宋子文（時任行政院長）就下台了。在台灣任台大校長時，每年入學考試，使他最感煩惱，因為很多有權勢的人替考生說人情。他告訴我，那時還沒有聯考，為了公平起見，所以他一律不賣人情，不怕得罪人，即使很有權勢的人說人情，也一律不賣帳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孟真先生是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」，的確是一位正人君子。不幸，列席省議會時，竟被無知無識的什麼「大炮」氣死了！民主云乎哉？

重讀此文感慨萬千

我寫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何以不能相容」，在知識界引起了很大的震撼，並非始料所及，而該文得到傅校長孟真先生的欣賞，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當時我寫那篇文章，只是因為大陸局勢不可收拾，內心有很深的感慨，認為當年大陸有些知識份子，也應負一部份責任。

我們知道，在抗戰之前與抗戰期間，就有少數高級知識份子，對共產主義予以同情與支持，他們以為，在理論上，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、人道主義，並無多大分別，而社會主義的理想，則是合乎人道主義的。因為他們有此錯覺與幻想，所以一部份知識青年受到影響，於是走上歧途。抗戰勝利之後，有些知識份子，對中共的同情與

支持，聲浪越來越大，國是紛紜，是非莫辨，民心士氣，隨之動搖，天下洶洶，莫可遏止了。

雖然那些高級知識份子，已為這種錯覺與幻想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，甚至犧牲了性命，但他們並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，乃是自由主義者；而問題的關鍵，是他們并不十分瞭解馬列主義的哲學思想，也不十分瞭解馬列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思想本質上的反撥性。卅八年夏，在台灣，有些高級知識份子，仍殘留着大陸時期那種誤解與幻想。心所謂危，未敢苟安，所以就寫出了那篇文章。現在雖已時過境遷，但那篇文章尚未失去時效，再加研讀，似乎還有重刊的價值與必要。附刊於此，以供國人參研並請指教。

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何以不能相容？

歷史事實為我們證明了，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是不能相容的，若問此二者何以不能相容，顯然由於它們在思想本質上有了很大的差異，這種差異，可如下述：

第一、共產主義是以全體主義為基礎的，自由主義則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——我們曉得，馬克斯是黑格爾的門徒，而黑格爾的思想體系，則是以全體主義為本質的，因此，馬克斯就不自覺的繼承了黑格爾的衣鉢，把共產主義的基礎建設在全體主義之上，不過黑格爾以「國家」為主體，而馬克斯則以「階級」為主體罷了，因為共產主義的背後是全體主義，所以在這種共產主義之中，就看不見「個性」和「自由」了。馬克斯

主義者所要培養發揮的，是以全體主義為基礎的「黨性」和「階級性」，在「黨性」和「階級性」之中，「個性」沒有存在的權利，「自由」則成為反叛的思想。馬克斯主義者是要拿一條全體思想的鎖鍊，把「個性」與「自由」緊緊鎖住，甚至要把「個性」與「自由」完全消滅掉，這種企圖，在列寧主義中表現得尤為明顯。

自由主義則不然，因為它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，所以對於個人的意志、思想、權利、自由異常尊重，實際上，這種自由主義的思想，就是以發掘個性，擴張自由為唯一目標，它要人人表現「自我」，人人實現「自我」，因為「自我」的發現與實現，才可以提高人生，造成進步。唯其如此，所以自由主義反對各種各樣的全體主義，黑格爾與希特勒手中的國家主義，馬克斯和列寧手中的共產主義，都要同樣反對，跟了自由主義而來的，則是「個人」、「個性」與「自由」，但跟了共產主義而來的，則是「全體」、「黨性」與「統制」，二者相差如此之遠，如何能够相容呢？

第二、共產主義是以獨佔主義為基礎，自由主義則是以調和主義為基礎的——馬克斯從黑格爾那裏學得辯證法，而辯證法的基本原則，是對立的統一。這個法則表現出來，一方面要發展事物的頑固性與反撥性，造成尖銳的對立和鬥爭，沒有妥協，沒有調和，另一方面則要從這種無妥協，無調和的對立與鬥爭中，求得絕對的統一與完全的獨佔，在辯證法中，調和是過渡的，暫時的和相對的，唯有統一才是真正的，永久的和絕

對的。因此，共產主義的教條，「不是我克服你，就是你克服我」，「有便全有，無便全無」，其間沒有調和均等的餘地，更不許有選擇的自由。

自由主義則不然，它所取的是相對主義，不是絕對主義，尚調和，不尚對立；尚均等，不尚獨佔，因為它相信相對的調和，較之絕對的統一；合理的競爭，較之無理的獨佔，更能滿足人類的要求，造成社會的進步。假如認為人都有與生俱來的自由與權利，人都有生存和發展的本能要求，那麼，最好的生活法則，應該是調和與均等，否則，人類將陷於無已的爭奪與暴亂了。美滿的人生是基於調和與均等，失去了調和與均等，也便失去了伊甸樂園。由此可知，鬥爭與獨佔，是一種反進化的思想。馬克斯主義看到若干不調和與不均等的事實，便連調和與均等的思想也否定了。自由主義的目標，則要保持調和與均等，使它日臻完滿、真實，二者相差如此何以相容。

第三、共產主義是以暴力主義為基礎的，自由主義則是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——共產主義的基礎哲學是唯物論。因此，所有的共產主義者，一方面把人類的理性估計得太低，認為人們不過都是貪婪殘暴的，自私自利的怪獸而已，沒有什麼道德良心，更不會照顧到別人的生存和發展，另一方面則迷信暴力，認為宇宙與人生的一切現象，都決定於一個「力」中，大制小，重制輕，「力」決定了一切，也可以改變一切，這種思想在列寧主義中，表現得異常濃厚而深切。唯其如此，所以共產主義者不相信理性，也不服從法律

，他們所迷信歌頌的，第一是暴力，第二是暴力，第三還是暴力。共產主義因暴力而生，也將因暴力而死。

自由主義相信人類是理性的動物，認為人類雖是自私自利的東西，但由於經驗與智識的增長，已漸能消滅獸性，長成人性，理性的伸長，使人類以道德代替衝動，以理智代替本能，以法律代替暴力，明白業已的界限，懂得人我共存的道理。理性減少了爭奪與殘殺，助長了協作與互助，造成了進步，提高了人生。今日人類的獸性，雖未全滅，暴力雖常蠢動；但是進步的方向，顯然要我們繼續去培養和發揮人類的最高理性。共產主義者想把人類拖回獸性與暴力的深淵，真是人類文明的一大劫運！因為自由主義是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，所以凡是信仰自由主義的國家與人民，都尊重「法治」，在政治方面，以「數頭的方式代替砍頭的方式」；共產主義主張暴力專政，要恢復砍頭的政治生活，二者相差太遠，何以相容？

第四、共產主義是以物性主義為基礎的，自由主義則是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，因為共產主義是以唯物哲學為本質的，所以共產主義的應用與發揮，就異常缺乏「人性」，對於一切事與一切人，他們都應用物理學的觀點去分析，因此，人就變成一堆物質的集體，而人類社會則成為一副機械的海洋了。在物性主義之下，人類的意志，情感與智慧，都沒有力量，而且也逐漸漸於枯萎死亡，人類的性格與人生的型式，絕對不容發生差異。唯其如此，所以共產主義者的思想與生活

，都異常機械、枯澀、僵硬而殘忍，簡直像枯寂、冷酷的冬天一樣，沒有絲毫的活力，意趣和溫暖！在共產主義的世界中，只有殘忍的鬥爭與機械的工作。

自由主義尚人性，講人道，因為尚人性，所以要放寬各種各樣的生活尺度，使人性獲得充足的發展和完全的實現。各人的意志，情感與智慧，都能自由的、和諧的、充足的發展，然後這個世界與人生，才有活力，才有生意，才能像溫暖的春天一樣，繁華如錦，百鳥爭鳴。人性的培養與發揮，才能產生人類的「愛」，以「愛」為基礎，才能建立良好的，公平的生活秩序，在良好的，公平的生活秩序中，才能產生和諧與進步，使人類獲得滿足與幸福，以實現人道主義。以人性為基礎，就是使人類的一切活動，都具有豐富的人底意義，不因物而傷人，一切爲了人，一切也屬於人。反之，以物性為基礎，則人與人之鬥狠，人與物之廝刃，都成為毫無意義，毫無目的的活動，說得上什麼人道呢？康德說：「愛爲吾人之原則，秩序爲吾人之基礎，進步爲吾人之目的」，而這一切則可以培養人性，發展人性為契機呀！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不同如此，何以相容？

基於以上說明，吾人可得三義：

一爲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鬥爭，實際上則是獸性與理性，物性與人性，是力與秩序，野蠻與文明，甚至是人類的愛與恨的鬥爭，因此，我們不可把這種鬥爭看作國與國間，或政權與政權間的鬥爭，要知道這場鬥爭的勝負，也便決定人類文明的興衰。

二爲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，絕對不能相容，而且共產主義的哲學，是有統一無調和，有獨佔無均等的，假如共產主義擡頭，自由主義便沒有存在的權利了。因此，我們絕對不可拿自由主義的調和思想去對待共產主義者，要知向野人講道理，那是很危險的。

三爲自由主義者要提高警覺，不要被共產主義者的暴力所懾，狡詐所欺，更不可認爲讓它試試看也可以，要知它一掌握政權，我們和後代子孫，都將永遠沒有「選擇的自由」了。

以上三義，質諸自由主義者，以爲何如？

保衛臺灣幾件大事

寫到此處，使我不能不想到卅八、九年間的危險情況。那時，我身為新聞記者，又追隨陳故副總統辭公左右，所以知道的事情，比一般人多些。想當年，看今朝，真是又興奮又感慨。坦白的說，當年誰也沒有想到，我們竟在台灣生活四十年，因爲那時大家的想法，大致是三五年會打回去；如果打不回去，可能只有死路一條——投海。誰也沒有想到，我們在台灣四十年，竟創了歷史的奇蹟——卅多年的太平盛世。我們怎能保衛台灣四十年，又怎能創出中國歷史上的奇蹟，那一段危險艱苦的歷程，今天四十歲以下的人，已經不知道，稍爲年長的人，可能知道的也不多，所以我寫一點可以公開的事實，對於振奮世道人心，或者不無裨益。

保衛台灣需要足夠的軍事力量，但是，當年台灣的兵力非常薄弱，只有一點青年軍和警察，

根本不足以抵抗共軍進攻。當時陳故副總統辭公任台灣省主席，看到局勢岌岌，乃派羅卓英將軍到福建，將胡璉將軍的部隊調來，駐守金門前線，後來共軍來攻，我們才能得到古寧頭戰役的勝利；如果沒有胡璉將軍的大軍駐守，予共軍以迎頭痛擊，台灣可能早已淪陷了。有了古寧頭的勝利，台灣才漸趨安定下來。

還有一件關乎台灣安全的事，現在也可以說一點，那就是大陸上殘敗軍隊撤退來台的問題。當時有些撤退來台的軍隊，戰力薄弱，軍紀敗壞，甚至被稱中共軍的先鋒隊；因爲那些部隊所到之處，中共便跟蹤而至，但政府對於撤退來的部隊，又不能不加收容。爲了保衛台灣的安全，於是乃決定先繳械，後下船，再整編。當時有一批部隊到達高雄港抗不繳械，政府派海空軍監視了三天，然後才被追繳械下船，聽候整編。如果那批部隊攜械下船，當時的台灣，既無優勢兵力可加監視約束，台灣安全與安定如何維持，勢將成爲大問題了。

當年的政治情況也很可怕，人心動搖，土氣低落，社會上充滿了悲觀的氣氛，中共潛伏台灣的份子，多方製造不安與動亂，連台北市的警察機關，都被煽被打。陳辭公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，看到危機四伏乃毅然決定限制入出境，以防止共謀滲透，鎮壓學潮，拘捕了十多名中共的職業學生與教員，沒有流血就平抑了學潮。當時政治上的最大危機，是極少數政客，假傳爭取美援之名，暗中搞美國託管的陰謀，所幸最高當局，洞燭其奸，解除了那個政客的職務。

在外交上，卅八年政府尚未正式撤退來台，

美國就發表了白皮書，等於中華民國還未斷氣，美國就替我們散發訃文。在台的美國大使館，只有一個參事代辦，美援已經完全斷絕。陳辭公任台灣省主席時，想在中部造一座橋，要求美國支援廿萬元(美金)，那個參事竟然回答：「現在你們還要替中共造橋嗎？」後來美使館有一位館員被調回國，臨行堅請管見省主席，辭公延見後，那位館員說：「我這次被調回國，是因為國務院密令指示，對國務院要報告台灣已經沒有任何希望，但我憑良心做事，報告台灣的事實，竟觸怒了國務院，所以才被調回，你們要注意國務院的陰謀。」當年美國的政客，是希望我們快點死亡，好一手抹去過去美國對華政策所犯的錯誤。那時我們在國際外交方面，幾已陷於絕境，好像國際間都在等待我們斷氣，後來韓戰爆發，我們才漸漸打開這種困境。

財經方面的情况也很可怕。在財政方面，預算赤字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，辭公接任行政院長時，發現駐外機構，已半年未發經費，於是決定先發駐外使領館經費。當時的情况，開源緩不濟急，唯有實行節流，緊縮各方面的開支，所以每年編製預算時，辭公急得兩三夜不能成眠。有一次，院會討論預算案，各機關均感經費過於短少，辭公便說：「今天任何機關都可以關門，就是中華民國不能關門」。因為財政如此困難，所以幣值物價波動不已，金鈔黑市猖獗，社會民生不安。政府乃從大陸搶運八十萬兩黃金來台，以充實通貨發行準備金，搶運大陸物資來台，以穩定

物價；實行幣制改革，掃蕩金鈔黑市，以安定金融；力求平衡預算，以防止通貨惡性膨脹；於是社會人心，才漸漸安定下來。

經濟情况也不好，卅八年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的毛額，只有六十美元左右，糧食產量只有七十萬噸，貧苦農民，多吃地瓜維生；農家副業、輕工業與對外貿易，都沒有發展，而大陸運來的物資，只能救急，不能救窮。怎麼辦？因為當時台灣經濟以農業為主，農產人口佔百分之六十以上，所以政府便決定實行三七五減租，放領公地，實行耕者有其田；同時，努力增加農業生產，以發展農業經濟，改善農民生活；并以公營事業股票，補償地主地價，引導土地資金轉入工商業，又多方獎勵人民投資工商業，於是輕工業很快發展起來，而對外貿易也隨之發展起來。韓戰爆發後，美國對華政策有了改變，美援也來了，使我們鬆了一口氣。

在此附帶一提的，就是台灣的土地改革，已成為世界的成功模範，也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動力(Driving Force)，所以很多國家派員來台考察

學習；但均未能見諸實行。為什麼？因為地主的阻力太大。我們實行三七五減租時，就有一位勢力很大的地主反對，辭公知道以後，便發帖請他到台北吃飯面談，期能化除阻力，那知那位地主害怕辭公的鐵腕，便悄悄東走日本，剩下的地主，都了解政府的苦心與決定，都能合作支持。

我寫這些零碎回憶，在使年輕的一代了解，當年國家的處境，不僅十分艱苦，而且危機四伏，真如大海中的一隻破船，又當風浪之中，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，幸賴全國上下，尤其是軍公教人員，均能共體時艱，一心一德，為保衛台灣與建設台灣而流汗、流血、流血，才能使國家從風雨飄搖之中，一步一步走上安定繁榮的大道，所以今天我們擁有這一片自由富裕天地，實非偶然，亦非天賜！倘有不能已於言者，就是今天年長的一輩，大多是當年為保衛台灣與建設台灣而流汗、流血、流血的功臣，現在有些無知小子，坐享他們汗、淚、血的成果，還對年長一輩的人，橫加侮辱，政治上還有什麼公道是非？這些忘恩負義，爭權奪利之徒，又怎能立國建國？

大專 最新應用文

邵 健 行 著
定價台幣壹佰伍拾元

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。書信的種類、結構、術語。便條。名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。題辭。啟事。廣告。……等應用文範例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